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

THE RACIO-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ANCIENT WEST-NORTH AREA, CHINA

韩康信 谭婧泽 张帆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

THE RACIO-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ANCIENT WEST-NORTH AREA, CHINA

韩康信 谭婧泽 张帆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韩康信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
ISBN 7-309-04430-4

I. 中… II. 韩… III. 居民-人种-研究-西北-
地区-古代 IV. Q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183 号

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

韩康信 谭婧泽 张帆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梁玲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517 千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 500

书号 ISBN 7-309-04430-4/K·147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n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Fudan University**

(1905-2005)

献给复旦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韩康信 1935年9月出生于日本名古屋，祖籍江苏镇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1962年至1973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1973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现兼任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学术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人类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古代人类骨骼的种族形态学研究。主要著作有《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150余篇。

谭靖泽 1966年12月出生于宁夏银川，祖籍宁夏银川。199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中医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专业，获史学硕士学位。现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体质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人类骨骼体质测量学和现代民族人类学研究，以及古代人类DNA多态性研究等。发表论文10余篇。

张帆 1978年3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祖籍江苏南京。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系遗传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2000年至今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人类生物学博士学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古代人类DNA多态性研究和现代分子人类学研究。发表论文10余篇。

本专著主要通过对我国西北地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和甘肃玉门火烧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古代人类骨骼进行体质测量学和形态学研究，重点分析和讨论了这两个墓地人口的性别年龄分布结构、人骨的形态变异量度、种族形态特征及与周邻地区古代和现代居民之间的形态学关系等问题。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有较早期的青铜时代卡约文化（距今约3300-3000年）和较晚期的汉代（距今约2000年）两个时期的人类学材料。研究结果表明相隔千年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代居民无论是卡约文化人群还是汉代人群具有强烈的同源性，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人口群，而且都表现出与现代藏族有着相当一致的综合体质特征，均归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这说明至迟在秦汉以前，在我国西北地区甚至包括新疆哈密地区便已存在与现代西藏居民，特别是西藏东部地区居民体质类型更为接近的人类群体，而这一体质类型的居民可能与史籍中记载的活动生息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古代氐羌部族有着极为密切的考古文化和人类学联系，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进一步证明了藏族居民，特别是西藏东部藏族起源于我国西北地区古代氐羌部族。

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年代大约为夏商时期（距今约3900-3500年），其文化被定名为火烧沟类型文化。火烧沟遗址位于我国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最西部，正好在古籍记述的“敦煌祁连间”乌孙、月氏部族早期活动的地理范围。《史记》、《汉书》中记述的乌孙、月氏的体质形态特征应该为“青目赤须”、“深眼多须髯”的西方高加索人种。而且前苏联学者对出土于中亚及邻近地区古代墓葬中的人骨材料进行了人类学研究，也认为乌孙、月氏部族应为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居民，并有少数欧洲人种与蒙古人种混血的类型。本项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玉门火烧沟地区的古代居民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东亚类群的性质，与我国中原地区殷商时期的居民有着非常接近的形态学特征，与西藏东部地区的藏族和现代华北汉族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在其人群的种族成分构成上没有发现任何确实可信的西方欧洲人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夏商时期的甘肃玉门火烧沟地区的居民不属于史籍中记载的曾经一度活动于河西走廊的乌孙、月氏部族的考古遗存。

本专著的最后结论是，迄今为止出自我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境内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秦汉以前的古代居民的人种性质，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尚未发现任何西方高加索人种因素。由此推测，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居民进入我国境内的地理界限大致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之间，其东进的时间主要在秦汉以前。但西方人种群向东方的推进至少在秦汉以前受到某种抑制，这种抑制的历史原因或许如史料记载的与东方人种群多次大规模地向西的运动有关，如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不同时间层次上都有过向西扩展的历史，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东方种族的逆向运动，加之汉代在西北地区的屯兵设郡等措施，抑制了西方人群进一步有规模地向华夏腹地的移动。

本专著还特别报告了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和汉代遗址中出土的古代开颅术的证据，并对手术部位、手术性质、可能原因，以及手术后的存活情况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记录。这些资料是研究我国原始脑外科和眼外科手术的重要发现。

序 言

中国西北地区,由于地处东、西方交汇地带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众多民族繁衍生息、聚散交融之地,尤其是自汉代以后它以“绿洲丝绸之路”闻名于世。河西走廊地区作为古代西域通往中原腹地的重要通道,曾是东、西方文化和人种的接触交汇地带,古羌族、乌孙、月氏及匈奴、蒙古等众多古代民族曾一度占据活动于此。青海地区则在秦汉以前是古代氐羌氏族活动生息的重要地区。所以对于甘、青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追溯中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古今各族人民的种族源流和演化关系等问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韩康信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体质人类学专家,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学术委员。他在《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一书中,应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甘肃玉门火烧沟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两个西北地区共计702个个体青铜至铁器时代古代居民的体质形态特征、种族属性,以及与周邻地区古代及现代人群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且对上述两个地点的人骨材料逐一进行了性别、年龄标志的鉴定及墓地人口结构的统计学分析。在材料的数量、观察测量技术及统计学方法上都保证了最终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韩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我们后辈学者的楷模。

该专著根据甘、青地区古代人骨与周邻地区古人骨测量特征的多变量比较,发现他们与黄河中、下游的殷商和周、汉代人骨之间有相对较近的形态学距离。因此认为黄河文明的载体应该主要是在体质上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接近的人群。其中,青海卡约文化(距今约3000年)和汉代(距今约2000年)人骨与现代西藏人特别是西藏东部人群之间存在相对密切的联系。这一研究结果支持现代藏族的种族来源与西北地区的古代羌系民族有更直接的关系。

并且对上述两个墓地的古人骨材料逐一进行了详细的性别和死亡年龄鉴定,统计结果表明这两个墓地人群的平均寿命并不高,大多死于壮年~中年,存活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很少。男女性别比例相对比较平衡,反映了这两个墓地的人口结构代表了比较稳定的居民群体。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人口演变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该专著首次从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文明及其种族起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认为充分的古代人骨材料证据证明在中国新疆境内发现的青铜至铁器时代人群普遍具有西方高加索人种特征,他们的足迹达到了新疆的东部。而甘肃和青海地区出土的大量古代人骨材料在种族属性上皆属于同种系性质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没有发现犹如新疆境内可信的西方种族成分。因此认为至少在秦汉以前,东西方种族人群在我国的接触似乎在新疆东部和甘肃地区西部之间有过相对稳定的“隔离”状态。从人类学上倾向于新疆的古代文化应该与西来的种族有密切的联系,而黄河流域

的文明及其种族起源应该主要是地区性的个性发展。这一结果对古代西源文化与黄河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另类思考方向。

该专著还提出了中国古代(距今约 3 000~2 000 年)原始开颅手术的证据,并对手术部位、手术性质、可能的手术原因,以及术后存活情况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记录。这些发现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上长期以来缺乏原始脑外科和眼科手术的空白。

该专著是作者继《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之后的又一部对我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力作。其数据资料具有较高的引用价值,统计结果科学严密,结论有很强的学术性。

韩康信先生还为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古人骨 DNA 实验室提供了相应的骨骼样品,希望能应用现已成熟的 PCR 和 DNA 序列分析技术,对这些地区古代人群的骨骼材料进行遗传学研究。对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的遗骨进行基因多态性分析,不仅可以验证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也会给氐羌、乌孙、月氏等历史上已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的种族属性、遗传信息及与其史前文化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对进一步了解这些古代民族的迁徙和基因交流等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保护和利用我国古代人类遗传资源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吴定良院士和刘咸教授建立的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曾经培养了众多优秀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历史的原因,复旦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在过去的 30 年中不复存在。本世纪初,在谈家桢先生、已故刘祖洞教授和众多原人类学专业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着手恢复人类学专业。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4 月正式挂牌成立。韩康信先生成为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员之一。本书的另一作者谭婧泽老师,也成为该中心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中坚。该中心在继承原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传统的基础上,借助复旦群体遗传学研究的优势和复旦大学文理兼优的特点,强调体质性状和遗传变异在人群研究中的交叉与整合,同时也强调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交叉,以研究中国人群的结构和源流,及寻找决定体质性状的遗传变异作为今后科研的主要方向。2004 年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生物学”专业博士点获教育部批准正式建立。而本书是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人类生物学”专业出版的第一本专著。

金 力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04 年 3 月 16 日

(一)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和甘肃玉门火烧沟两处墓地的发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北地区的两项重大考古收获。上孙家寨一带地处河湟之间,秦以前为古羌人聚居区,两汉时期是多民族杂居区域。上孙家寨墓地发掘青铜时代卡约文化墓葬 1 113 座,是目前已发掘卡约文化墓葬最多的一处,极大地丰富了该文化的内容。在上孙家寨墓地还发掘出两汉和魏晋初的墓葬 182 座。从这里汉晋墓的文化面貌看,以汉文化为主体,又明显保留有其他多种民族的文化因素。甘肃河西走廊也曾是古羌人生息之地。玉门火烧沟地处河西走廊,在火烧沟墓地发掘火烧沟文化墓葬 312 座,年代约夏代至夏商之际,当属古羌人西部的一支。《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种族研究》之一《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人骨的研究》和之二《甘肃玉门火烧沟古墓地人骨的研究》是对上述两地古代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经科学鉴定和大量检测统计,其主要结论是,甘肃地区古代人骨在种族上皆属于同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接近的类群,它们与黄河中、下游的殷、周和汉代人骨之间有相对较近的形态距离,其中青海卡约文化和汉代人骨与现代西藏人特别是西藏东部人的骨骼之间存在相对密切的联系。同时,还对墓地人骨性别年龄的构成、死亡年龄的分布、头骨上的暴力创伤、古病理以及十分罕见的外科开颅术例证等,都进行了观察和记述。总之,该项课题研究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与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相配合,对深入开展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以至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种族的起源问题,都有帮助和启示。

任式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2004 年 9 月 3 日

(二)

该项目是对青海和甘肃两大批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人类骨骼材料的研究。上世纪早期,“中国人种西来说”兴起,在学术界影响颇深。后来,由于周口店人类化石发现,“本土起源说”才被接受,但“西方因素”在黄色人种(蒙古人种)形成过程中是否起过作用,有多大作用,在人类学界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人类学界对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多地区起源说”这一学派强调东亚地区人类演变是以“连续为主,基因交流为辅”的模式。但这种基因交流—种族混杂,始于何时、程度如何、分布地区、演变历史等等,至今无法解答,因此,该项目的关于西北地区的古人类骨骼的种族属性方面的研究,将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

河西走廊是古代西域通往中原腹地的重要通道,也应是“基因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该研究项目对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和汉代大型墓地出土的 284 具人类头骨

研究之后,认为这批古代居民具有蒙古人种东亚类群的特征,没有发现西方人种的确定影响;对甘肃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120具头骨材料的研究结果是“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东亚类群的性质”,也没有发现“可信的西方人种的影响”。这些结论说明了当时的基因交流实在有限甚至不大可能——“至少在秦汉以前东西方种族人群在我国接触似乎在新疆地区东部和甘青地区西部之间有过相对稳定的‘隔离’状态”。该研究发现这一现象不仅对“中国人种西来说”及其有关的问题予以明确的解答,也对现代人类起源问题的理论基础予以澄清。因此,该项研究成果对人类种族形成和现代人类起源的研究将有深远的影响,也提示了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人群迁徙、生态环境与文化因素的互动作用。

该项研究取材丰富、充实;在材料处理上既运用国际公认的传统方法,也结合了新近发展的数理统计技术,分析严密;有齐全的观察项目和测量项目且具可比性。因此,该项研究的结论是可信的,其数据有较高的引用价值和参考价值。

该项研究首次发现中国古代(距今约3000年)的开颅手术的证据,填补了医学史上脑外科和眼科手术史料的空白。其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分析结果,则是我国人口演变史上的重要证据。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将起“范本”作用,在学术界将有重大反响,不失为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张银运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

2004年9月4日

(三)

考古学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长久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西来说及本土论。利用体质人类学的人骨形态测量学方法检验上述两种说法的学者更是少得凤毛麟角。这本大报告的作者首次使用由青海省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卡约文化头骨211具及汉代头骨73具进行骨骼性别、牙齿标志的鉴定及墓地人口的统计学的科学分析。这批珍贵的资料堪称是中国考古遗址发掘出土数量最多及保存状况最好的,因此其研究的结论可说是可信度较高而且颇具学术价值。

这本报告的四大学术贡献分别是:第一,头骨形态测量及分析的方法依照国际统一的标准观测头骨131项至138项,累计的数值档提供未来国内及国外族群分析的珍贵比较资料,未来更希望能多进行体骨的形态测量比较分析。第二,卡约文化及汉代头骨上出现中国古代原始开颅手术的证据,可说是这本报告的另一大学术新发现。第三,两处墓地的古人口学分析提出人口结构属于比较稳定的居民群体,提供了考古学家们推断古代文化变迁族群组成的生物背景资料。第四,作者的研究结论:中国新疆境内青铜—铁器时代的人口是具有西方高加索人的人种特征,而甘、青地区的古代人口却属于现代蒙古种的东亚类群。这两项研究成果对西来说及本土论提供了时空不同的文化传承及断裂的另一类思考方向。

何传坤

中国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主任、人类学博士、研究员

2003年11月25日

前言

在这本论著中主要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西北地区古代墓地人骨的研究报告。一个墓地位于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另一个墓地在甘肃省玉门火烧沟。两者都是考古学上发掘的大型墓地,都有非常丰厚的文化遗存发现,是我国西北地区少见的考古遗址。从墓地所在地理位置来看,都处在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河西地区。它们的时代,青海的上孙家寨遗址主要包含两个时期的墓群即大约距今3000年的卡约文化时期和距今约2000年的汉代。甘肃火烧沟遗址的文化属性考古学者称之为“火烧沟文化类型”,其内涵与较早时期在西北地区发现的所谓“四坝文化”相似,距今约3600年。这两处墓地都挖掘于上世纪70年代,虽说出于各种原因考古报告尚待正式刊出,但都被考古界认定是我国西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其中除了丰富的各种随葬品外,还同时采集了大量人类遗骨。如经我们鉴定的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和汉代人骨便多达635个个体,火烧沟文化的人骨也有257个个体。可惜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将这些入骨全部运回,因而至今仍感到甚为遗憾。在本专著中报告的是从中挑选出来的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骨,这是研究古人种族形态最为重要的材料。其中,上孙家寨墓地的头骨多达284具,火烧沟墓地的也有120具,两者合计共404具。这些材料都没有正式发表过。这些材料之丰富和保存之完整也是迄今国内古人骨研究中为数不多的最优良的系列材料之一。当初的设想是在我完成这些材料的研究之后附录于各自的考古专刊之中。但由于考古报告的整理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上时时要应付和完成其他工作,把这些人骨的研究拖延了下来。此外,人骨材料数量大,其中有要原文随附大量的原始测量数据,将它们全数完整附录于考古报告之中在所占篇幅上又有很大的困难,而我又不愿割舍这些原始资料,因而促使我萌生出单独出版专著的想法,为后续的研究者留下可供核查的依据。尽管对这些材料的整理完成拖后到退休之后,但毕竟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它们,这多少在我的晚年生活中带来了些许的轻松,也是为我从事一生的学科做了一点贡献。

在这里应该提一下我涉足甘、青地区古人骨的情况,这大概是一种机遇。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革”的混乱尚未完全过去,特别是“破四旧”运动使国内文物遭到了严重损坏。政府为了对破坏文物的行为和向世人展示中国人有保护文物的传统,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并由国家文物局领导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其时尚在“五七干校”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被调回北京,组成了有夏鼐、宿伯等著名考古学家参加的筹展领导小组。当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由裴文中、吴汝康两位先生主持的古人类研究室工作。我记得王冶秋先生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当时还在北郊祁家豁子三号楼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要求派人参加筹展小组并负责旧石器时代的展示内容。由于“文革”的混乱尚未过去,裴文中和吴汝康先生还未被解脱,不知何故,所里就派了我这个“文革”中的“观潮派”去参加这项工作。以后几个月我天天到城里故宫上班,在那里认识了许多从全国各省区抽调来参加筹展的文物干部和文物考古工作者。和他们相熟之后,有人对古人类鉴定之类的问题有兴趣,希望我给他们讲一讲。于是我从所里带了一些标本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讲了如何从骨骼上判定男女和年龄等方法,并大致介绍了古人骨的鉴定

在考古学上的某些应用。同时在与他们的聊天中了解到他们过去在考古发掘中面对大量出土的人骨不知如何处理而将它们丢弃之类的事很为可惜。他们和我口头约定,以后再挖到人骨时,一定请我去帮助鉴定。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在后来考古工作逐渐恢复开展后,这些在故宫认识的考古朋友便时不时来信要我到考古工地帮助鉴定。其中便有当时在青海省博物馆筹备处的赵生琛和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的吴怡如等先生的邀请,使我多次有机会去他们那儿接触到青、甘地区出土的大量古人骨,包括上孙家寨和火烧沟两个遗址出土的为数众多的材料。幸运的是在我于1973年“文革”时期调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承担人类学的研究后,虽仍处在天天被动应付政治运动之中,但对所外的大量业务工作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在出差及工作经费上一般也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因而使我们有机会外出接触和收集一批又一批古人骨材料。而且老所长夏鼐先生从一开始就支持将我们的人类学研究报告发表在面对全国的《考古学报》上。他甚至对我说:“在每期《考古学报》上都可以发表人骨报告”。因此,就我们的工作而言虽任职于北京的考古所,但实际的服务对象是面对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并且一旦外单位有所求,我们都尽量应约而往。“文革”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种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工作经费上,无论所内还是所外单位都越来越紧张,以至于所外单位的邀请如果对方不负担费用就难以外出工作。因此基本上停止了主动收集外单位提供的人骨材料,这是很遗憾的事。

我于1973年初到考古所对自己的工作方向并没有固定的想法。考古所的库房内有一些由颜闾先生生前收集和测量过的人骨。颜闾先生原来也是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调来考古所从事古代人骨的人类学研究。库存中人骨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但完整者数量并不多。因此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自己去收集新的材料。不过作为过渡,在同事的建议下,将颜闾先生生前已经完成测量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两小批材料进行了整理,这就是发表在《考古学报》和《考古》上的河南庙底沟二期和陕西横阵仰韶文化的人骨报告。但正如前边已经提到,其时已经面对了大量的中国西北地区还包括出自新疆境内的人骨。这些人骨无论从保存的完好程度还是从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保存在库房里的材料。因此我到考古所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多次勤跑甘、青地区 and 新疆,尤其是在我接触和感觉到新疆出土的古人骨在形态上与甘、青地区的古人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之后,我的工作重点便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包括新疆在内的大西北地区了。并且从工作的安排上着重在弄清新疆古人骨的种系特点。为此我花了大量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寻找与新疆周邻的前苏联境内的人类学资料。幸运的是我在上海中学和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学习过俄语,到北京中科院工作时又有俄语文献的一般汉译训练,因而比只会西语的人更有条件利用大量的前苏联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去审视新疆的材料。为此我翻译了几十万字的俄文资料,初步了解了有关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乃至前苏联东欧地区古人骨的种族形态特点及其时空分布概况。在此基础上我才开始陆续对新疆境内多个地点收集的总共300多具头骨分别做了生物测量学的研究,并以单篇报告的形式发表于《考古学报》和《人类学学报》等刊物上。这一成果后来主要集中在我的《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之中。这项工作的主要之点是从骨骼形态和测量的研究上充分证明了在中国的秦汉王朝以前,在新疆境内栖居的主要居民是来自不同方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他们群居的地理界限达到了新疆的东部哈密地区。而在这个时限里,东方的蒙古人种成分在新疆虽也有发现,但其数量少得多,而且呈个别零散状态出现。有了这个种族分布概念,回过头来考察甘、青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古人骨的种系特

点并与新疆境内材料相比较就更为清晰和容易了。但要具体理清这两个地区的种族反差和这种反差对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的意义自然还需要进一步对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大量古人骨进行详细而更为广泛的调查和研究,了解玉门关以外古代种族的属性和分布,他们的来源等历史背景。而出自我国西北地区的大量古代种族人类学资料又对研究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与可能来自西源种族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过去的长时间里,学者们从古文献、考古材料甚至语言学的发现等不同方面寻求各自的理解和说明。而直接从古人骨骼的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去探索和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对客观评价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没有或多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一种客观的指示器。

应该指出,利用古人骨的人类学研究直接了解西方种族对中国的影响早有例子可循,但由于材料不多和缺乏科学的考古发掘而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例如就新疆的材料而言,我查到的资料是出现于上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有英国的A·基斯(A. Keith, 1929)、德国的C·H·约尔特吉和A·沃兰得(Corl—Herman Hjortsjo und Ander Walander, 1924)及俄国的A·N·优素福维切(A. N. Ingefovich, 1949)等发表过为数不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外国探险家从新疆掠走的。对西北地区的古人骨只有瑞典的解剖学家步达生曾经发表过甘肃史前人骨的研究报告(D. Black, 1928)。这些材料是瑞典的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甘肃作考古发掘时收集的,由于他从考古学上指出中国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可能源于中亚的彩陶文化而被当时许多中外学者认定是中国文明以及种族起源于西方的新考古学证据,因而对他收集的这批人骨的种族特点颇为关注。他把人骨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著名解剖学家步达生先生研究。后者在发表最初的简报中曾指认其中有3具头骨与其余头骨有不同的形态倾向而称为“X”型。按他描述的特征如鼻梁较高,面部扁平度较弱等显然暗示与高加索人种接近。如果属实,则说明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史前时代便存在由西方而来的种族成分。然而不久在他出版的正式研究报告中又纠正了他原来的看法,认为这3具“X”型头骨与其他多数头骨一样,是同一个人群中的变异而已,而且认为甘肃史前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因而将他们称之为“原中国人”(Proto-Chinese)。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结论,也有悖于当时中国文化乃至种族“西来说”的思潮。但仅此个别地点且数量不多的材料能否确认在史前和早期有没有西方种族涉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显然还很不充分。这个问题一直滞留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西北考古发掘开展之时,我们有机会在甘、青地区收集到大量古代人骨,并陆续有些材料发表。其中包括青海乐都柳湾和民和阳山的新石器时代人骨(潘其风、韩康信,1984;韩康信,1990),铜器时代的青海湟中李家山和循化阿哈特拉山的卡约文化人骨(韩康信、张君,1991;张君,1993;韩康信,2000)。甘肃则除了本专集的一大批火烧沟人骨外,还完成有沙井三角城的青铜时代人骨(韩康信,待刊)。此外在西北的其他地区如陕西神木的商周时期和汉代人骨(韩康信,待刊;韩康信,2001),宁夏海原新石器时代和固原彭堡青铜时代人骨(韩康信,1993;韩康信,1995),还有最近完成的固原开城元代人骨(韩康信,待刊)。加起来也有百多具头骨。在这些不同地点和时代的人骨中也还没有发现可以认定为西方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个体。目前可以从人骨上确认的西方人种成分的只有陕西西安的安伽墓和宁夏固原的史家墓,但它们的年代都在秦汉时期之后的更晚的时代。如果将以上西北地区的材料按地点划分,每个地点的人骨数量的调查还是不多的,即使从统计学的观点也不能是大的人口群,虽然他们比步达生的材料在地区的代表性和标本数量及所代表的时代上更为丰富。而在本专集中发表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和甘肃玉门火烧沟两

处人骨可供详细观测的便多达 404 具头骨,即使从样本的统计数量上应该是更具代表性,因而对阐明我国西北地区古代人口的种族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科学价值。如果加上前述许多地点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学资料,这一科学价值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了。而且从西北地区古代人骨的形态特征与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的种族关系来考虑,涉及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些地区的种族关系史的重大问题,也涉及如何合理地看待西源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黄河流域的文化以及它的时限和空间分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专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的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姊妹篇”,也是我一生从事中国古代人类学研究最具重要意义的成果的一部分。

应该说,目前在中国对考古发掘出土古代人骨的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表现在中国现在几乎没有专门培养人类学特别是体质人类学专业学生的高等学校。复旦大学在上世纪 50 年代开设了这个专业,但在“文革”中遭到了严重摧残而难以恢复,这是件很遗憾的事。个别学校虽也有人类学学生的培养,但从师资力量上缺乏深厚的专业学者。因而对学生的学习和训练缺乏熟练的医学特别是解剖学和生物统计学的基础。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一些论文来看还有许多硬伤,如对研究的题目范畴内的资料缺乏基本的掌握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有的用人骨的形态特征生硬地解释诸如历史上的族别和族源问题。也有的把人骨的某些组内变异套用去解释考古学上的某些文化差异或者把体质形态类型与考古文化类型等同起来,甚至出现将历史上种族的政治和文化的分裂说成是种族的分裂,其根据仅仅是不同的学者对人骨形态类型名称的不同。有的还将明明是高加索人种的头骨定性为蒙古人种之类的常识性错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出来。这类情况还可举出一些,但作为学术论文出现于某些刊物上又和缺乏严格的专业审稿有关。这类现象也反映了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的某些浮躁学风不良倾向也已经影响到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这里举一个考古界前辈的例子或许可以对问题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就是中国考古学上著名的李济先生。在战前他主持了著名的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除了获得大量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存之外,还从这个遗址的发掘中采集了大量殷代人的遗骨。他这么做与他在美国学习过人类学有关。回国后虽然转向了考古学,但他始终未忘记保护这些人骨,在内战的后期又将它们运到了台湾,现在仍良好地保存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类学组。对这些宝贵的人骨李济先生尽管在美国学习过体质人类学课程,但他没有自己动手研究。他曾对美国的老师表达过从事人类学的愿望,但他的老师认为搞人类学最好要有医学博士学位,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转向了考古学。并且将殷墟的大量人骨交给了留学回来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吴定良博士。后者是在英国师从当时国际上有名的人类学大师 K. Pearson 教授,并有许多重要的人类学论文发表,是当时国内仅有的多年严格训练的专业人类学家,也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夏鼐先生也是如此,他在为我们编著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种研究却需要有踏实的基础训练。除了要掌握一些操纵测量仪器的技术之外,这些训练还需要包括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和统计学等。尤其是解剖学更是从事体质人类学者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在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既需要有不厌其烦的耐性,又需要有力求精确的谨严学风”。夏先生也特别提到李济先生曾经说过的“考古学家一定要有体质人类学的常识,但是要想成为真正合格的体质人类学家,最好先取得 M. D. (医学博士) 学位”。他也认为李济先生之所以后来放弃体质人类学工作就是缘于此故。由此可见,无论是李济先生还是夏鼐先生都认为人类学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和做好的。他们以身作则和要求专业,并示训于后人。这和时下个别非专业学人对人类学的浅薄学风相差甚远。

在这里我还特别提一下复旦大学的人类学的简单情况。我的大学5年寒窗(1957—1962)是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度过的。就我的记忆,上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大概模仿了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在复旦的生物系设置了人类学专业。这实际上是将此前浙江大学的人类学调整到了复旦大学,当时的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是吴定良先生。如前所述,吴定良曾学习和工作于英国的伦敦大学8年之久,并获得了统计学和人类学两个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回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人类学组和筹组人类学研究所以及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所长。1948年经多轮筛选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组的第一届院士。从名义上讲,我是解放后吴先生主持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时的第一届招收的10名人类学学生之一。吴定良先生其时是教研室主任。除了亲自教我们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课程之外,还开设了生物统计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学术渊博功底深厚,又具有强烈专业心的可尊敬的老师和科学家。他最擅长的是用生物测量学的技术和方法来从事古今人类学问题的研究,也是中国早期最具专业训练的优秀人类学家和中国人类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为人朴素平实,对学生很民主,学生可以无顾忌地与他讨论甚至争论问题。有时学生显得不礼貌也从未见过他发脾气。我年轻时性格比较孤僻,不善于和老师亲密交往,在学生时期对老师的认识比较浅薄,对吴先生的上述认知是从进入工作岗位面对各种复杂的人与事的比较过程中加深起来的。除了吴定良先生外,教研室还有几位老师,如赵一清先生和刘咸先生。赵先生是跟随吴定良先生一起从浙江大学来到复旦的,他给我们上人体解剖学和人种学两门课程,也是我后来的毕业论文的评定老师。赵老师教学认真细致,为人和善,对学生是更多宽松和鼓励。刘咸先生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老师,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归国后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并和吴先生一起调整到复旦大学。遗憾的是在50年代“反右扩大化”时被卷入政治漩涡,这个政治包袱一直背到“文革”以后才被平反。这个不幸的历史耽误了他才华的发挥,我经常看到他在生物系图书室门口看门又静静地读书。我只记得他对我们这一届学生开设过民族志课程,并且是选修课。还有一位吴先生的研究生吴融酉老师,当时她还年轻,我们叫她小吴先生,曾教生物统计学课。她为人热情,性格活泼外向,和学生关系融洽。她后来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人类学组合作,在对云南和东北的10个少数民族的体质调查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位老师邵象清也是吴先生的研究生,眼睛高度近视,读书用功,曾给我们带过实验课。多年前我在北京书店里看到他编著的人体测量手册,对后来学习人类学的测量技术有实用价值。听说前些年他到美国遭遇车祸不幸丧生。最后一位老师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董悌忱先生,好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他是我们一届快毕业时来到复旦人类学教研室的,因此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他在苏联留学期间曾写过一篇有关巨猿是猿类而不是人科生物的文章,也曾带学生到广西作过民族体质调查。后来听说在“文革”初期因莫须有的罪名,不堪羞辱而自杀。吴定良先生也在病中被抄家受惊吓,在极度失望中去世。听说吴先生生前有个红皮本,收集了他毕生发表于国内外的论文和资料,但在“文革”的抄家中被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赵一清老师虽然熬过了“文革”,但身心的不畅也在几年后辞世而去。如此一场浩劫使复旦的人类学从此一蹶不振。教研室虽有几位年轻人留下支撑了几年,但后来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复旦的人类学专业从此消失。由此留下了一个疑问:偌大的多民族的国家究竟要不要人类学?直至今天没有人认真回答过这个问题。不过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队伍中出了3位国家级的院士:除了吴定良先生是解放前的院士之外,现在中国科学院的吴汝康和吴新智两位是解放后的院士。说起来吴汝康先生年轻时曾是吴定良先生的助理,后来自费留学美国

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不久回国先在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任教,然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在中国古人类学的研究上有重要的建树。吴新智先生是吴汝康先生的研究生,也是从大连医学院过来的。他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目前虽已年迈但还在古人类学领域工作着。他和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共同提出的现代人多地区起源的假设是目前人类学界的一个流派。碰巧这3位先生都是长江流域的人,也都姓吴。我们这些吴先生甚至三吴先生的学生虽没有获得像他们那样的学术名望,但都在各自的人类学岗位上作出了我们的贡献,并有许多科学上的成就,在中国的人类学事业上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我自己设想,中国的国土很大,人口和民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地下古人类资源也比较丰富,不时有新的发现呈现于世界。尽管目前的人类学有走向低谷之势,但随着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人类学重新走高的日子相信在若干年后还会出现。我也期望复旦大学最近成立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能为中国的人类学留下一点“种子”,不要让她完全泯灭。生命科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研究,而人类学的研究应该是属于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后说一下这本专集的出版。由于我不善于求人筹措出版经费,退休以后已经不抱希望,因为人类学工作在我们研究所不是主流学科,虽没有它不行,有它也不容易和主流的考古学竞争,要获得出版经费实在不容易。几年前我因事回上海去复旦母校看望我的学生,碰巧接触到复旦大学遗传所的金力和金建中老师,他们正在筹建古DNA实验室。他们有兴趣从基因的研究中探讨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并且有重要的论文发表于国际著名的学术杂志上。2002年还成立了“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提出了这个中心以后开展工作的初步设想。其中除以遗传学为中心外,还考虑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进行共同研究。他们在了解了我为出书的困难后,主动提出要帮助我。此后,特别是我的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的学生谭婧泽主动花费大量时间整理了这本专集,还有该研究中心的张帆博士也为这本专著的出版付出了重要的劳动。如果没有以上各位的帮助,这本专著是殊难面世的。在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受教于复旦的学子与校友,并为纪念教导过我的前辈老师们,特将此专著奉献给复旦母校,预祝母校更加欣欣向荣,也祝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以及复旦的人类学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此外,还应该提到整理专集前后及人骨资料的某些前期工作的方面。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慷慨提供人骨材料的青海省和甘肃省考古所的诸多考古学者和工作者。就我记忆中的有赵胜琛、卢耀光、陈国显、苏生秀、苟相全、李恒年、李国林等诸多同志,正是他们在多年的考古发掘中收集了大量上孙家寨墓地的人骨。还有张学正、吴怡如先生以及有些未能记住名字的同志为我提供了火烧沟遗址出土的丰富人骨。此外,我所的潘其凤同志在初期对部分上孙家寨人骨作过初步的性别年龄鉴定。考古所的张君、古脊椎所的刘武和北大的郑晓瑛等年轻同志也分别帮助测量过部分人骨。而考古所西安研究室的左崇新同志在西安对这些入骨的清洗、编号、上架等方面作出了辛勤的劳动,在火烧沟头骨的照相中得到了马晓宁同志的帮助。最后特别应该提到在我整理报告最感经费困难而无望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对退休人员提供的基金资助。还有我的夫人祁国琴也为这本专集的出版作了许多工作。对这些帮助,作为本专集的主要作者均表示深切的感谢。

韩康信

2003年7月15日

完稿于宁夏吴忠

目 录

序言	i
学者鉴评	iii
前言	v
第一部分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人骨的研究	1
THE STUDY OF THE HUMAN BONES FROM SHANG SUNJIA ANCIENT CEMETERY, DATONG, QINGHAI	
一 前言	1
二 材料和方法	2
(一) 人骨材料	2
(二) 性别年龄鉴定资料	2
(三) 比较资料	2
(四) 研究方法	4
三 比较结果和分析	6
(一) 墓地人口和性别年龄构成的统计	6
(二) 头骨形态考察结果	9
(三) 头骨测量特征变异度的统计学估计	24
(四) 头骨的种系分析	28
(五) 身高的测定	52
(六) 头骨创伤和开颅手术的例证	59
四 结论和讨论	62
(一) 性别年龄鉴定及死亡年龄分布	62
(二) 头骨的形态特征	63
(三) 头骨测量的种系分析	63
(四) 身高的测定	63
(五) 头骨上的创伤	64
(六) 开颅手术证据的发现	64
注释	65
Summary	68
附录一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卡约文化和汉代墓葬头骨测量表(平均值)	69
附录二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卡约文化头骨个体测量表(男性组)	73
附录三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古墓地卡约文化头骨个体测量表(女性组)	103